



錢大昕像 取自《清代學者象傳》

清代乾嘉學者對書法風尚的影響

陳暉仁

以錢大昕之金石學與隸書為例

清代是中國學術發展的興盛時期，乾隆、嘉慶年間，漢學大盛，經學、史學各門研究蓬勃發展，不論在經義、禮制、名物、文字、聲韻、訓詁、天文曆算、地理、金石、版本、目錄等領域，名家輩出。其中錢大昕通貫各學，為乾嘉學術重要學者。清代書法發展，至乾嘉年間，重心逐漸由帖學移轉至碑學，且篆書、隸書興盛，帶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本文試從錢氏金石學研究，一窺乾嘉學術對隸書興盛之影響。

清代書法流變

清代在中國書法史上，是發展輝煌的時期，風格數變。清代前期承襲明代書風，董其昌受到高度推崇與效

仿。而顧炎武、朱彝尊等學者帶動了金石學研究，也開始影響當時書法風格。乾隆皇帝熱愛趙孟頫書法，書風遍及科場、官場上所使用的館閣體，

又彙刻《三希堂法帖》等，使社會上尊尚著法帖書風。至乾嘉時期，經學考據興起，文字學、金石學大盛，推動了碑派書法的興盛，書法家將眼

光著重在篆書與隸書。道光、咸豐以後，碑派書法家取法金石學所蒐羅的各種文字材料，將筆法運用擴大至楷書、行書、草書等創作，大大創新了書法從來所能呈現的面貌。

關於清代金石學影響碑學發展之情形。清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在〈尊碑第二〉說：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為考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巖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鋤，或搜自官府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摹拓以廣其流傳。若

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緝成巨帙，遍布海內。其餘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於是碑學蔚為大國。適乘帖微，入鑽大統，亦其宜也。

因為乾嘉年間重視金石學，石刻材料蒐集越來越多，研究者證者也相對增加，金石學風行，於是書法亦重視碑學了。《廣藝舟雙楫》〈本漢第七〉又指出：

書至漢末，蓋盛極矣。其樸質、高韻、新意、異態、詭形、殊制，融為一爐而鑄之，故自絕於後世。晉、魏人筆意之高，蓋在本師之偉傑。

將漢代隸書置於極高地位，故爾碑學特別重視隸書。至於乾嘉金石學興盛後，所帶起的隸書風氣，何以能突破前人，別開生面呢？清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一〈書學·隸書〉中有

兩段話可以參考：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若唐人則反是……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主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答曰：猶之說經，宋儒既立，漢學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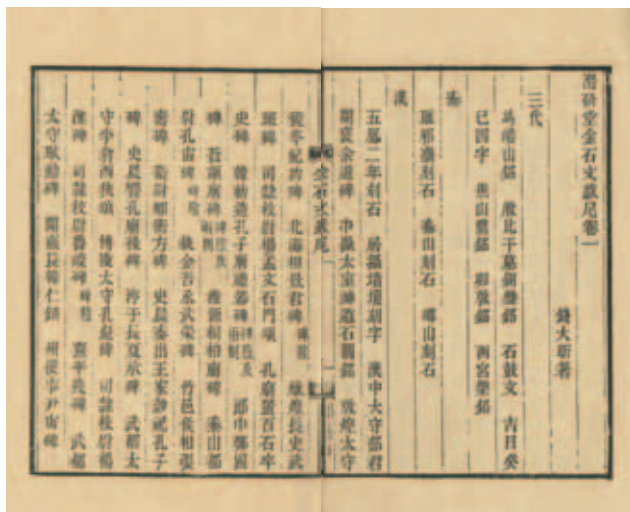
錢泳是乾嘉年間的書法家，尤擅長隸書。他的看法是：前人的隸書過於雷同，所以呆板，且文字學不發達，無法掌握字形正確架構。隸書材料來自漢碑，各碑石即使尚在，前人不重視，要等到清代學者重視後，隸書才興盛，能與前人風格不同。茲以錢大昕的金石學與隸書為例，以探究乾嘉金石學術的發展對隸書的影響。

錢大昕之金石學及其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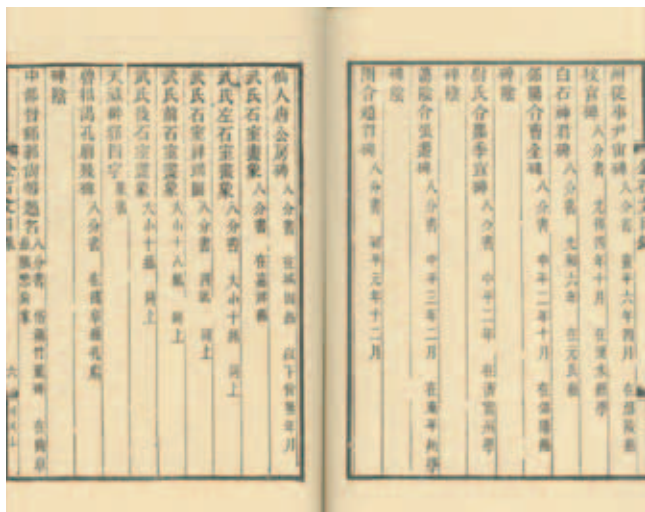
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

讀書心細絲抽親
鍊句功深石補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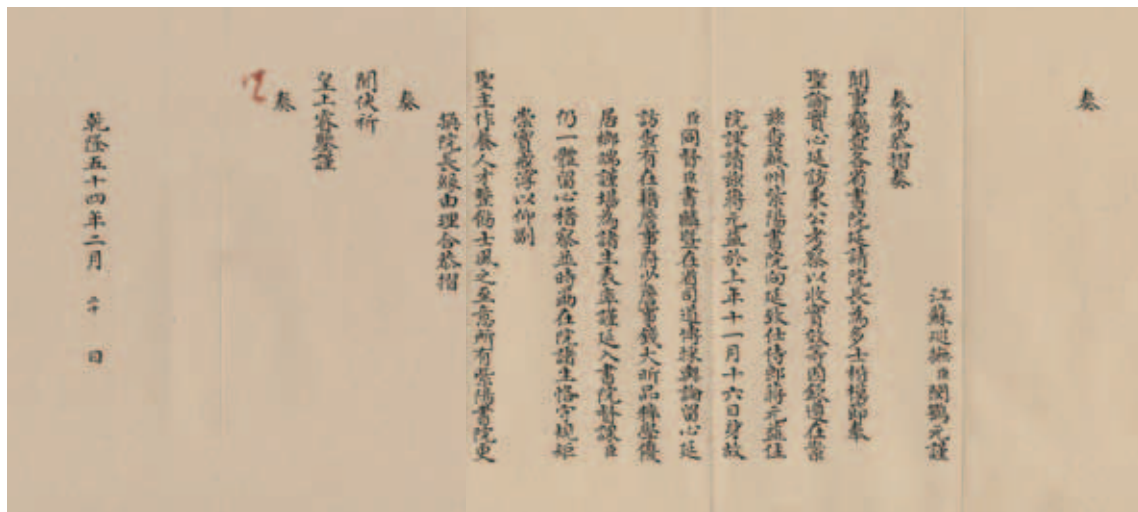
竹汀錢大昕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清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重刊本



錢大昕收藏的隸書（八分書）拓片部份清單 見《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 清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重刊本



江蘇巡撫閔鶚元奏〈蘇州紫陽書院以錢大昕延入書院督課摺〉 乾隆54年2月20日 5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嘉年間各學界一流的學者，幾乎都與錢大昕有所往來，並且受各界敬重。後世評論清代漢學家者，更將錢大昕、戴震、惠棟三家相提並論。

乾嘉年間，達官顯宦常邀請學者為其編刻書籍。乾隆開四庫全書館時，招致不少學者聚集北京工作。又江南社會繁榮，私家藏書興盛，各地書院帶動求學風氣，各學門形成研究群體，學者交流密切，地方學風大盛。錢大昕與這些活動都有關連，尤其出掌江南地區書院二十多年，其名望學識更受景仰，對學術風氣影響力愈大。例如《潛研堂文集》中，可見他為許多學術名著題序，如畢沅《關中金石記》、阮元《山左金石志》、盧文弨《群書拾補》、惠棟《古文尚書考》、段玉裁《詩經韻譜》、阮元《經籍纂詁》、謝啟昆《小學考》、梁玉繩《史記志疑》等，可知乾嘉時錢氏之名望與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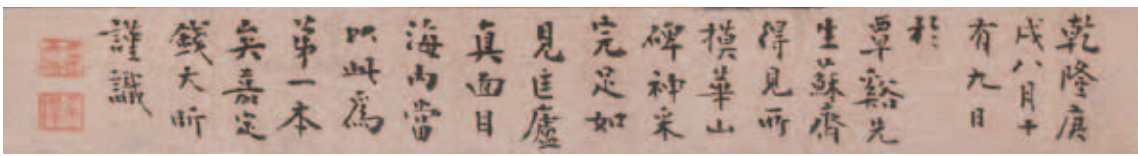
錢大昕研究學問，一本清代漢學家的初衷，從考究精確的文字與音義開始，以求取正確的解讀，所以費盡心力，而且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不以

成」者，就直指錢大昕學問既精且博，視為通儒了。

錢大昕之學術成就，與其一生經歷交遊，有密切相關。少年求學時，與王鳴盛、王昶定交，三人為終身摯友。王鳴盛後來為史學家，王昶後來輯有《金石萃編》，為清代金石學重要著作。入學蘇州紫陽書院時，又結識經學家惠棟。

二十四歲上北京出仕，二十多年宦生涯，歷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五十一歲後，出任南京鍾山書院、太倉婁東書院、蘇州紫陽書院等院長，在紫陽書院達十六年之久。現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還存有地方官上報錢大昕出任紫陽書院院長之奏摺。嘉慶九年卒（一八〇四），享年七十七歲。

錢大昕一生二十多年為官，二十多年出掌書院，除了致力著作之外，其往來之學者、門生，例如紀昀、戴震（經學家）、朱筠、翁方綱（經學、金石學家）、趙翼（史學家）、盧文弨（校勘、目錄學家）、段玉裁（文字學家）、阮元（經學家）、黃丕烈（版本學家）、顧廣圻（版本、



清 錢大昕 題翁方綱摩華山廟碑 行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藏家未見全文，遂以為真漢刻矣。」言元人吳炳的隸書雖有法度，然缺乏漢代淳古氣息，一般收藏家不知辨識，若只見到碑文時，遂誤認為東漢隸書。可見錢氏於隸書風格判定之眼界甚高。

四、〈淳于長夏承碑〉（按：亦作〈夏仲充碑〉）稱「字體奇怪，王秋澗以為蔡中郎書，雖出臆揣，要是漢隸之佳者。今再經翻刻，古意盡失矣。」夏承碑在明嘉靖年間毀壞，之後重刻。錢氏從字體上判別是隸書的佳作，但翻刻失真，非原作之罪。所謂「字體奇怪」者，乃書碑者刻意加入篆形結構所致。

五、〈白石神君碑〉（按：亦作〈白石山碑〉）稱「或疑此碑為前燕重刻，予觀其字體方整，已開黃初之先，漢隸適逸之格，至此小變。然慕容僭偽，詎能辦此？況字體亦絕不類。要為漢刻無疑矣。」言此碑隸書開魏黃初板整習氣，但仍不是後代所能重刻出來的字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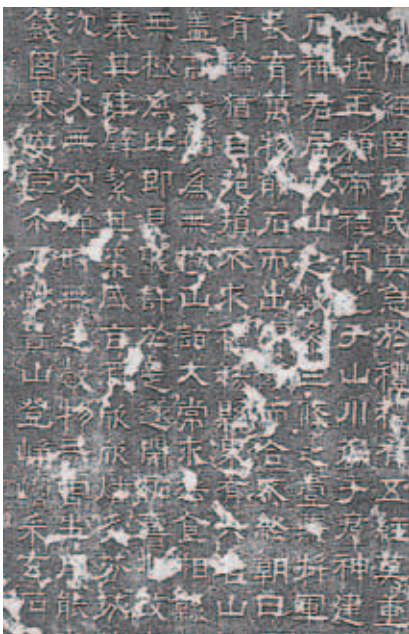
從以上幾則來看，無疑地，錢大昕對於隸書是有相當深度的研究與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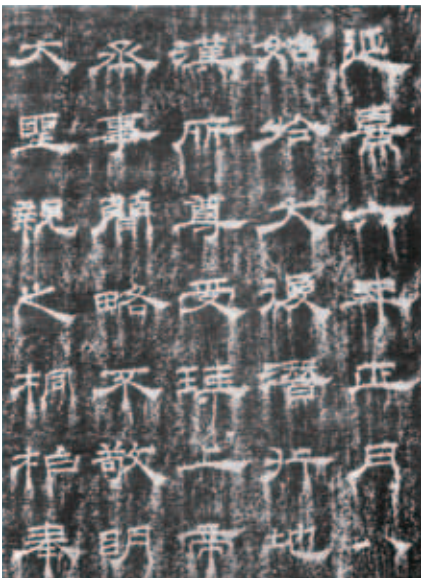
漢 淳于長夏承碑拓片 局部



漢 漢中太守鄒君開褒斜道碑拓片 局部



漢 白石神君碑拓片 局部



漢 淮源桐柏廟碑元代重刻拓片 局部

集》、《十駕齋養新錄》、《竹汀日記鈔》等。

錢大昕利用碑刻的文字來考訂字形、音韻，以及史書上所記載職官、地理、氏族等之不足或錯誤，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但亦有從隸書書法角

悟的。其在學術成就上顯赫的名聲，

雖遠遠超過他在書法上的名氣，但錢氏的隸書，還是極具特色的。錢泳

漢碑隸書尙少。清代所見隸書名碑，如《張遷碑》（明初出土）、《衡方碑》（清雍正年間出土）、《曹全碑》（明萬曆初出土）等，都是晚近才發現的碑刻，大大豐富了隸書的文字材料。且清代文字學者、金石學者長期鑽研小篆、隸書字體，治學較嚴謹者，對各字體結構與筆法，熟悉程度遠超過一般書法家，實踐於書法上，亦較平常書法家有更多心得，所以乾嘉時期有不少學者精於隸書，前引錢泳《履園叢話》言乾嘉隸書名家八人，前三人之翁方綱、桂馥、錢大昕，正是著名的文字學者與金石學者。乾嘉學者促進小篆與隸書字體之復興，引起了當代書法界對於碑刻文字的興趣與重視，進而再將小篆、隸書書風發揚光大。

從錢大昕的「讀書心細」、「鍊句功深」聯語，或可想見清代經學家「讀書甚敬」、「作字便佳」的特殊書風之形成。

書法資料承蒙本院教育展覽處游國慶先生教示，特此申謝。

作者為本院圖書文獻處研究助理

結語

金石學自宋代發祥，歐陽脩《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等名作，所見

度來觀察者，以下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一、〈漢中太守鄒君開褒斜道碑〉（按：亦作〈開通褒斜道碑〉）稱「文字古朴，東京分隸傳於今者，以此為最先焉。」詳析摩崖石刻，以為東漢分書現存最早者為此刻，可知其熟稔東漢隸書之風格流變。

二、〈敦煌長史武斑碑〉宋代歐陽脩時，已稱此碑文字殘滅，不成文章，錢氏親見拓本後，指碑陰有「武氏碑」三字，「頗近六朝人筆法。歐、趙諸公所未見也。」六朝人隸分斬截規整而乏韻緻，錢氏由碑陰之字體，判斷此碑寫立年代較晚，而此為歐陽脩、趙明誠等前輩學者所未知也。

三、〈淮源桐柏廟碑〉（按：亦作〈桐柏淮源廟碑〉）稱「元人重書本。……漢刻久亡，元至正四年……乃請翰林待制浚儀吳炳重書。……炳分隸頗有法度，而少漢人淳古之氣。碑末〈記〉亦炳所述，行書，殊道美。……而碑估之點者，往往割去炳重書字及碑後〈記〉，裝界成冊。收